

季理斐与广学会报刊发行事业之考察

宋艳华 谭树林

【摘要】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是广学会第四任总干事,曾担任《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的主编,负责广学会报刊的编排与发行事宜,对近代上海报业发展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季理斐主持广学会新闻局,通过官员代销报刊、赠刊转载、庆典联络权贵等方式,在传教士、官员、阅报者之间构建了互动关系网。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广学会报刊的发行范围,也为近代中国报业的开蒙提供了多元化的样板。不过,在中国近代民族意识觉醒之际,广学会在华报刊发行事业举步维艰,最终彻底走向本色化转型的道路。

【关键词】季理斐;广学会;报刊;发行

【作者简介】宋艳华,历史学博士,青岛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谭树林,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宗教学研究》(成都),2024.1.183~19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青岛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代青岛报刊与岛城集体记忆之建构研究”(QDSKL2201082)、2023年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专项“近代欧洲出版商与中国典籍域外传播研究(1840-1949)”(23CLCJ07)阶段性成果。

近代报刊既是知识传播的载体,也是开启民智的重要媒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精英阶层不断探索学习西方以实现自强、自立的发展道路,这给广学会办报立言营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清末民初,广学会以报为介,传播西学,在近代上海报刊史上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申报》曾载:“《万国公报》《大同报》《中西教会报》此三种杂志,为早期中国最名贵之出版物,执笔者均为当时之名士,对于灌输新知识,尤为努力。”^①这三份报刊均由广学会发行,季理斐不仅是执笔者之一,还均曾担任主编。通过编辑、发行报刊,季理斐与中国官员、文人建构了在华关系网络,也参与到广学会“阅读共同体”的建构历程。截至目前,学界对季理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豫北置产、文学成就及主政广学会事宜,对其在华办报活动的研究尚付之阙如。^②本文拟梳理季理斐编辑

报刊的实践活动,探究其拓展广学会报刊在地方发行的渠道,并如何以此建构在华官员互动关系网,以期揭示广学会在中国近代民族意识觉醒之际努力融入本土社会的场景。

一、广学会报刊之创办情况

广学会,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于1887年在上海创建,初名同文书会,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创办之初,广学会已格外注重报刊的社会功能,并于1888年首次年度报告中将报刊发行列入长期发展目标,即在中国及华人所在之处出版与传播基督文学,“特别是广学会资源范围之内适合所有阶层的报刊材料”。^③在具体运营模式中,广学会列出三类期刊出版计划:“一种规格、特性相对较高的报刊,适合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一种适合妇女与儿童的报刊”;“一

种适合学校男孩的报刊”，^④力求满足中国所有阶层的阅报需求。

1890年，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继任广学会总干事。他秉持广学会“以报刊之声荣耀上帝之名”的理念，认为掌控了中国报刊出版的话语权即“控制了国家的头和脊梁”。^⑤基于此，报刊立言被广学会确立为向中国精英阶层灌输西方文明与宗教理念的重要策略。1891年，李提摩太制定广学会发展方案，内含“创办针对高级阶层的报刊”“在省会建立书报销售点”等举措^⑥，企图扩大在中国官员、文人间的影响力。据此方案，广学会进行报刊的创办与重组，先后刊行《成童画报》(1889)、《万国公报》(1889)、《中西教会报》(1895)、《大同报》(1904)、《女铎报》(1912)、《福幼报》(1914)、*Quarterly Link With Our Friends*(1914)、《明灯》(1921)、《平民月刊》(1925)、《道声》(1930)、《女星》(1932)等十几种报刊。可以说，广学会之所以成为近代基督教在华文字机构生存期较长、影响力最大的出版社，与这些报刊的广泛流通密不可分，而季理斐亦与这些报刊关系匪浅。

(一)《万国公报》

在广学会创办的所有报刊中，当属《万国公报》发行范围最广、社会影响力最大，被季理斐自诩为“首次将广学会推到聚光灯下的著名报刊”^⑦。《万国公报》的前身是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于1868年在上海创刊的《中国教会新报》(*The News of Churches*)，创刊旨在联络信徒，传递教会讯息。运营期间，此报几度易名^⑧，刊物性质逐渐脱离纯宗教叙事，后于1883年出至第750卷停刊。1889年2月，《万国公报》(*A Review of the Times*)复刊，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此报专以开通风气、输入文明为宗旨，栏目设置以政论、时评、学说为主，辅之以介绍世界新事、新物，是面向中国官员、文人的政治性读物。当时，翰林院诸学士曾选辑该报西学文章，辑成翰林院出版物。^⑨此报在中国报界也风靡一时。1895年，康有为创办的北京《万国公报》，袭用其名，其文章大部分来

源于上海《万国公报》。^⑩1896年，由汪康年、梁启超创刊的《时务报》初期言论对此报也有借鉴。

1901年，林乐知休假赴英美参会，季理斐初次参与《万国公报》的编辑工作。1902年，林乐知回国继续经营该报，季理斐便退出该报。待他再次参与该报事务，已是1906年，此时林乐知因病赴美休假，缺少主心骨的《万国公报》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季理斐先是接任代理主编，1907年担任正式主编。^⑪他花费大量心血提升报刊质量，尤为重视阅报者的视觉体验：一面增加图片以吸引读者兴趣，一面采用品质更高的洋纸来改善印刷。同时，他有意增加中国作者的社论文章，来扩大此报在华人群体中的影响力。除负责编务之外，季理斐还为《万国公报》撰文，1906、1907两年即高达316篇，内容以普及科学知识、评论时政为主，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近代中国“世界知识”的生产与流通。尽管季理斐采取多种措施维系运营，但在周刊盛行之下，《万国公报》还是于1907年停刊。

(二)《中西教会报》

《中西教会报》(*Missionary Review*)由林乐知于1891年2月在上海创办，意在振兴教会，促进中西相通。该报定位群体是在华传教士及基督教徒，设立初期主要栏目有喻说、喻道要旨、播道事、新闻、杂事等。然未至三年，此报便已停刊，共出35册。该报停刊缘由在于受众单一，“聚焦宗教话题，很难期望它的传播范围、影响力度与《万国公报》相较”^⑫。1895年1月，《中西教会报》复刊，册次另起，成为广学会的正式刊物。林乐知因工作繁忙，推举美国传教士卫理(Edward Thomas Williams)继任主编。此后，慕威廉(William Muirhead)、高葆真(William Arthur Cornaby)、华立熙(W. Dilbert Walshe)、莫安仁(Evan Morgan)等人先后担任主编。

1909年1月，季理斐接管《中西教会报》主编一职。他在与西方教友的通信中，表达兴奋之情：“本报存有特殊之处，它既是布道者杂志，又是教会间的

粘合剂。我相信,它的影响范围会更加广泛。”^⑬季氏将此报栏目调整为社论、圣经阐述、祷告生活、讲坛、传记、故事以及教堂新闻,以满足教友的阅读需求。1912年1月,在季理斐的倡议之下,《中西教会报》更名为《教会公报》。他认为,此报更名能回归宗教本源,遂与广学会华人编辑陈金镛、董景安再三商酌后,定名《教会公报》,以期“开通智识,培植道德,鼓吹全国教会自立与联合”^⑭。“鼓吹”一词,可见这并非出于广学会本意,更多是中国近代民族意识觉醒之际的自救举措。由此,此报从最初的一味促进中西教会联合,转向支持中国教会自立。同时,季理斐亦着手报社的人员调整,将办报权限悉交华人之手。在其举荐下,华人冯九卿担任《教会公报》主编,这是广学会第一次将报刊的编辑权全权委托给中国人,体现了传教士意识到只有主动推行基督教本色化转型才有可能融入到中国本土社会。

1917年,《教会公报》停刊。鉴于受众基督徒人数有限,加之运营资金不足,尽管订阅者遍及中、美、澳、加等国,此报销量一直不高。季理斐感言:“教会报纸,万难赚钱,又须取缔不合宜的广告,是经常费用须大费筹措,其创办困难实可想见。”^⑮不过,季理斐认为此报虽专为传道者而设,却也为传播科学知识的新闻栏目留有足够空间,故自视甚高:“自它创刊以来,各教派相继效仿办报,但只能作为补充,却无法取代。”^⑯晚清普通民众消费能力与识字水平有限,传教士想象中的读者认知与现实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中西教会报》的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季理斐以报宣教的策略并未奏效。

(三)《大同报》

《大同报》(*the Chinese Weekly*)是广学会于1904年正式发行的周刊,由高葆真担任主编。此报以“交换智识,输入文明”为宗旨,受众聚焦于中国的精英阶层。1907年,《大同报》实施改良,重申办报宗旨:“一曰辅新政;一曰匡教育;一曰培人格”^⑰,并将栏目调整为图画、论著、译述、谕旨、新闻版块,力图传播西

方最新知识。山西巡抚恩艺棠对此评价道:“自法政、教育及农商、工艺,靡不分门别类,推陈出新,为报界中放一大光彩。”^⑱

季理斐为《大同报》大量供稿,从1907年至1914年共撰文120余篇,在内容选译、编排上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需求。不过,在具体行文过程中,为凸显基督教,季理斐对其他信仰的评价有失公允,始终以“俯视”的姿态来审视中国文化。在《医学之新方针》一文,他将中国医学的贡献全部归功于上帝:“中国自古聪颖,特达之士,发明医学,如华佗、扁鹊辈,概皆上帝备为世人去其疾苦者也,且足见为上帝爱人之证焉。”^⑲这恰佐证了广学会后期出版委员会主席薄玉珍(Margaret H. Brown)的言论,即广学会发行刊物始终以基督教为落脚点向中国人申述当前世界时局变革,难去“洋味”。^⑳

1913年,季理斐接任《大同报》主编。他对加拿大长老会总干事麦凯(Robert Peter Mackay)讲述该报的运营困境:“由于革命的影响,订阅名单大幅减少,我希望重燃社会人士对这份报刊的兴趣。”^㉑在他看来,《大同报》应继续引介西学,否则传教士将丧失“知识中介”的地位。为提升销量,季理斐着手《大同报》内容改良,除遵循常例撰写的文章外,就道德、民主、农学、卫生等主题进行组稿。同时,在维系原价的基础上,每周增加20页篇幅。这必会增加成本,但此举却增强了竞争力。

1915年,《大同报》再次进行改良,由周刊改为月刊,更名为《大同月报》。在内容设置上,月报分为图画、论著、记录、译述、杂纂五大版块,增添了哲学、传记的比重。月报每期封面登载的主编姓名是莫安仁,但季理斐也参与了实际的编排工作。这在1915年6月季理斐寄给麦凯的信函中可略见一斑:“莫安仁先生参加了在华北举行的浸信会议,在他缺席期间,再次将《大同报》交给了我。”^㉒不过,《大同报》改为月报后,销售惨淡,于1917年停刊,共出575期。

(四)其它报刊

1919年,季理斐担任广学会代理总干事,将广学会的出版重心回归宗教领域。鉴于学生群体在“五四运动”期间展现出惊人的社会力量,季理斐将广学会的受众目标转向青年学生。1921年6月,广学会创办《明灯》(*Shining Light*),旨在与学生群体在学理、事业、思想上讨论宗教问题。季理斐担任《明灯》社长,李路德担任主编。自此,广学会一直延续季理斐制定的受众定位,不再局限于上层阶级,“除文士外,更推广到妇女、儿童以及中国大部分稍识字的平民”^{②3}。《女铎报》(*Woman's Messenger*)与《福幼报》(*Happy Childhood*)的运营推广,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报刊的发行,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近代中国妇女、儿童、学生群体的思想启蒙,也成为广学会在反教社会场景下获得持续资助的有效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广学会曾于1914年创办一份专门联络海外差会的英文报刊——《每季会友》(*Quarterly Link With Our Friends*),现馆藏于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这份报刊先后由季理斐与其夫人(Mrs. MacGillivray)主编,栏目并不固定,创办目的是向基督教海外差会汇报广学会最新情况,并募集运营资金。1919年12月4日,季理斐就社会资助在此报致谢:“万分感激远隔千山万水的朋友,给予我们金钱上的资助,也给予我们更加弥足珍贵的爱和祈祷。”^{②4}

整体来看,广学会擅长以报立言来更新报者的知识仓库,其发行的报刊具有多样化、针对性、定位广的特点。其中,《万国公报》《大同报》的定位群体是中国官员、文人,是其维系“知识中介”的媒介平台;《中西教会报》专为基督徒而设,是纯粹的宗教刊物;《明灯》《女铎报》《福幼报》则将学生、妇女和儿童纳入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的受众群体之中,这些刊物被季理斐自诩为“广学会的翅膀”^{②5}。季理斐深入参与到广学会报刊发行事业,扮演了主编与撰稿人的角色,并将办报活动与中国本土教会人才的培养相结合。理应指出的是,季氏虽鼓励中国教会自立,

但前提是不能摆脱西方教会的协助。在《中华教会自立自养之善喻》一文,他将中国教会比作鸡卵,西方教会比作酒杯,鸡卵若想稳固需依附于酒杯,中国教会若要独立需先依靠西方教会的帮助。^{②6}可见,广学会本色化转型是以西方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推行本土化的程度并不彻底,这亦是这些报刊最终难逃停刊命运的原因所在。

二、季理斐报刊推广与广学会“阅读共同体”建构

近代报刊传媒产生之后,如何吸引读者阅读是备受关注的核心问题,“劝民读报”是晚清以降报人共同秉持的理想与追求。广学会发行报刊旨在以报为介,向时人介绍西方文化进而参与中国社会变革。然而,报刊推广并非易事,这涉及资金、编辑、印刷、发行营销等众多环节,与邮政运输、政治变革等外部环境亦关系紧密。为使更多的中国官员、文人阅读到广学会发行的报刊,季理斐采取多渠道推进报刊在全国范围内的发行,参与了广学会“阅读共同体”的建构过程。

(一)赠刊试读

赠刊试读是广学会建构“阅读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即广学会向中国官员、文人免费赠送新刊。季理斐经营报刊的心得是“不要积压市场,要提高效率与质量”^{②7},印刷出库的报刊无论是售卖、代派、赠刊。亦或过刊邮寄,须要物尽其用。《大同报》创办初期正是通过赠刊举措,逐渐打开知名度。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谈到首次阅读该报的体验:“兹复惠寄贵报一册,接读之下,敬佩无极,鸿篇巨制,津逮后学,厥功匪尠,拟即定购贵报。”^{②8}至1905年,《大同报》每周被全中国超过60位政府要员所阅读。通过前期的宣传与传阅,《大同报》以赠刊试读的方式在政府官员中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

赠刊试读也体现在过刊的处理方法。1906年,《教务杂志》刊登一封季理斐写给基督徒卡德威尔(J. E. Cardwell)的信件,提到广学会对过刊的处理方法,读者只需支付邮费便可免费获得:“广学会准备免费

提供《万国公报》和《大同报》的过刊,内容丰富,将引导读者全面理解真理的价值。”^②订购需付邮资3元,余额予以退还。赠刊试读的推销途径,不仅可以及时处理积存的过刊,也可为阅报者节省订阅成本。

赠刊试读势必以资金为践行后盾,季理斐任职广学会期间积极筹备资金。1918年,广学会因物价上涨导致印刷成本增加,报刊销量不佳。在季理斐的协调之下,广学会接收中国各差会的资助金额比前一年高出50%,并依旧推行免费赠报:“我们为藏书楼、语言学校和传教学校提供了价值约500美元的免费报刊,甚至可以在法国的中国劳工营看到。”^③1923年秋,季理斐还曾发起“五年发展项目”,计划筹集81250美元用来增加人员、改善印刷设施、刊登广告和赠送书报。

(二)官员代销报刊

广学会设法推广《万国公报》,除在沪设置发行中心,还在18省主要城市设立代销机构。不过,《万国公报》坚持精英阅读策略,售点少,导致乡村、小镇难购其报。浙江姚文倬曾向汪康年吐露此事:“和战之事,所云《万国公报》之言最详,此间并无此报,无从得悉。”^④1907年,《万国公报》停刊之后,广学会吸取经验,力求打破地域发行限制。其中,最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官员代销制,即政府官员或地方乡绅直接订购或代销报刊。《大同报》主要撰稿班底李提摩太、季理斐、高葆真、莫安仁等人向中国政府要员致函表达代销报刊的请求,这在近代传教士中文报刊史可谓创新之举。

1907年,大同报社致函山东布政使吴廷斌,希望山东官员代销此报。吴廷斌回应:“嘱派《大同报》一事,自当遵办。”^⑤此后,山东巡抚杨士骧亦回应:“已与吴方伯商准,请每期寄下九百份以广流传手。”^⑥山东之外,其他省份官员亦乐为代销。两广总督周馥在给广学会的回函中,称“请尊处先寄一百份来,即自明年中历正月为始,以后察看能否畅销,再行增加”^⑦。山西巡抚恩寿对代销一事表态:“自当力效绵

薄。”^⑧当时较为偏僻的西北地区,《大同报》也得到推广。陕西巡抚曹鸿勋称:“已飭各属自向贵会从多订购,以广传阅。”^⑨

官员之所以应邀代销,与1907年《大同报》特设图画专栏,专登中外达官肖像相关。官员以肖像入报,附信函于后,借此塑造报刊形象,抬升社会地位。山东布政使吴廷斌曾言:“今附入报中,传之海内外,从此身价倍增,曷胜荣幸,官非司马,容貌竞重于海疆,才逊潞公,声名亦播于绝域。”^⑩官员乐于选择在此刊载,一是看重广学会影响力大,报刊辐射范围广;二是此报较于它刊,印刷品质更为精良。季理斐曾向读者发出请求,以期获得优质照片:“现正竭力确保定期供应中国公众人物、公共建筑、集会等插图,我将感谢您提供适当的照片。”^⑪

在报刊担当主媒的时代,以李提摩太、季理斐、高葆真为代表的广学会编辑群体另辟蹊径,以像入报,创新了官员形象营销模式,又借由官员代销报刊成功进入地方阅读市场。这既扩大了官员的社会影响力,也扩大了广学会报刊的知名度,两者之间建构的互动关系网存在共赢利益。季理斐也于通信往来中结识官员,曾向张謇请求题词,用作《大同报》封面以提升报刊影响力。可以说,广学会藉由《大同报》与中国官员之间的互动是一场知识与权力的互惠合作。不过,合作的前提是双方存在共同利益,随着民国建立,清政府官员的更迭使《大同报》的代销策略影响式微。

(三)主持新闻局

民国建立之后,广学会发行报刊官派份额减少,愈加重视其他报社的文章转载数量,以此向新晋官员证明其社会影响力。1913年,广学会特立新闻局,由季理斐主持,负责广学会报刊推广事宜。季氏实行“转载赠刊”策略,即其他报社转载广学会报刊中的文章,便可获赠该会最新报刊,这促进了广学会与中国其他报社间的互通往来。

广学会新闻局每月固定两次向中国各大报社邮

寄《大同报》的文章，“希望它们能被转载，以便在中国至关重要的话题上形成舆论”^⑧。季理斐也主动寄文至各大报社：“自担任《大同报》编辑以来，我将刊内文章发送给中国各地约20家报社。答复令人欣喜，许多报刊全文转载。通过这种方式，读者人数大大增加。”^⑨据广学会统计，《大同报》在1913年4月至5月共发表22篇文章，“共追踪到68篇重印本，这还不包括引用过文章的《香港基督教日报》(the Christian Daily of Hongkong)及各种宣教材料”^⑩。可见，转载赠刊效果良好，《大同报》某种程度上成为阅报者均享的“共同知识文本”。

当然，季理斐并非盲目荐文，而是有其针对性。1913年，河南旱灾严重，季理斐向相关政府部门自荐农学文章：“我向北京农业委员会发送旱作农业的文章，指出豫晋灾区引进旱作新技术已刻不容缓。该委员会发行的《农林公报》，在第2卷第20期摘录《大同报》文章。在上帝的带领下，引入旱作硬质小麦许是挽救数百万人生命的手段。”^⑪即“旱地种麦法”的引介推广，《农业浅说》与《农商公报》亦转载此文。此外，季理斐所撰的《记美国种稻新术》被译介到日俄两国。至1914年，广学会报刊转引率大幅提升，重新赢得上层社会关注度。

(四) 庆典联络权贵

庆典，多指社会组织就纪念日、节日或某一重大事件而举办的庆祝典礼。隆重的庆典仪式可提高举办方的社会知名度，是广学会推广报刊的重要途径。广学会每年12月邀请董事会成员及资助者参加年度庆典，印刷年度报告手册，内附书报销量，借此吸引新的资助。不宁唯是，广学会还以报刊庆典为契机，注重联络民国政府官员。1914年，适逢《大同报》创刊十周年纪念，季理斐向中国政要特约题词。时任大总统袁世凯称此报是“百国宝书”^⑫，应予以推广，人手一册。副总统黎元洪在贺词中对《大同报》引介西学给予一定的肯定，“宏编巨制，炳炳煌煌，世界政闻，儒先哲理，捆载而来，惠我学子”^⑬。陆军总长段

祺瑞则将《大同报》比拟英国《泰晤士报》，认为此报“价值超出各种新闻之上”^⑭。此外，外交总长孙宝琦、司法总长梁启超也应邀发词庆贺。

实际上，媒介庆典是一种文化传播仪式。美国学者凯瑞(James W. Carey)指出，“在仪式观中，传播的本质在于以一种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⑮。中国官员参与到《大同报》十周年庆典，缘于他们有“阅报者”的共同身份。政府要员之所以应邀发贺电，与广学会一直以来推行的官员代销报刊、报社赠刊转载策略息息相关。某种程度上讲，阅读世界反映了权力的展演与抗争，互动网络建构的前提是群体间存在共赢的利益。

报刊承负着知识媒介的重任，是建构广学会阅读共同体的一环。晚清，季理斐以报为介与中国官员形成了互动关系网，推行官员代销报刊制在客观上推动了官员对新式报刊的传播。与之相对，中国官员群体与广学会在推广报刊的目标上达成共识，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抬升社会身价的利益考量。民国初年，季理斐组织的新闻局实行转载赠刊策略也有力推进了广学会的报刊发行，并以庆典为契机，重新与新政权官员建立起互动网络。一言以蔽之，西学的知识空间与群体间的利益牵连带动了文化市场的生意经。

三、季理斐多渠道报刊推广活动对广学会报业的影响

晚清以降，士人常阅报纸来知悉时局及增广见闻，传教士就此从事印刷出版活动来传递新知，以学辅教。以广学会为代表的基督教在华出版机构集力办报，本意在于宣传上帝福音，却为中国士人提供了“悉夷情”以“制夷”的窗口。季理斐通过赠刊试读、官员代销、报社转载、庆典造势等多渠道推广报刊，不仅助推了广学会乃至近代上海报业的繁荣，也创新了近代传教士在华报刊发行的路径。

(一) 广学会报刊销量上升

季理斐首次接触报刊编务是1901年暂代林乐知

主持《万国公报》，该年此报销量畅通。据贾立言回忆当时情形：“从1901年十一月起，到1902年十月为止，共印四万八千五百本，平均每月在四千本以上。约计三百万页，亦可见其风行一时之概了。”^④1906年，季理斐正式接管《万国公报》，此报年销售量是30000册，相较于1905年销量27622册略有提升，但未能扭转信息流通时代月刊的劣势，此报以1907年22300册的销量停刊。1909年，季理斐主编《中西教会报》，此报年销量基本维持在9000册左右，无较大改变。

在季理斐各种发行渠道的推广之下，《大同报》的销量提升最为明显。笔者依据广学会年度报告档案^⑤整理该报销量列表如下表1。

由表1可知，《大同报》在1907年实行官员肖像入报，推行官员代销制之后，销量大幅提升。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大同报》失去了清政府的庇护，销量锐减。1913年，季理斐主持广学会新闻局以来，以《大同报》为联结点，通过报社转载赠刊及庆典联络权贵的方式，重新获得一定的社会关注度。不过，《大同报》改版为月刊之后，销量维系在8500册左右，远不能和昔日盛况相比。

1919年，季理斐担任广学会总干事，恰逢白话运动盛行给广学会施以巨大压力。以往广学会为吸引文人精英的注意，出版书报多以文言书写，白话版本只占少数。季理斐感叹：“何况八股式的著作，好比旋磨岩石一般，辗转多年，石头磨光了，毫无半点生气。”^⑥广学会被迫改变以往文言的书写模式，进行本色化转型，将定期报刊调整为白话发行，力推《明灯》《女铎》与《福幼报》。此举顺应变革中的社会对于文学改革的需求，也使广学会发行报刊得以继续流通。到1921年，《福幼报》的阅读市场除却中国，也“传阅

于加拿大、美国及马来西亚的华人”^⑦。同一时期，《女铎》的月发行量达1000余份。

(二) 广学会报刊发行范围扩大

最初，广学会报刊的发行范围主要集中在上海，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广学会承认此报在上海并无竞争优势：“上海由于本地日报供应充足，这种级别的周刊在本地的发行量很少。”^⑧在季理斐等人多渠道推广之下，广学会报刊的发行范围推广至省、府县。贵州抚台庞渠庵认为此报传播新知：“贵州杂处苗民，与他省异，骤语以世界新理，殊有少见多怪之虞。”^⑨驻藏大臣张荫棠曾要求广学会华西分局向其定期邮寄《大同报》，计划按照此例在拉萨开办新报。^⑩在各省督抚的应允下，许多地方官员短时间内了解并订阅《大同报》。甚至，广学会报刊发行的范围不限于中国，澳大利亚、巴西、缅甸、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新加坡、美国等国均有订单。^⑪

1913年，季理斐主持新闻局之后，广学会报刊发行受益颇多：“一年内，转载重印多达115篇文章，而重印这些文章的报社分布在十二个不同区域，即松江、汉口、宁波、广东、长春、天津、北京、山西、福州、吉林、重庆、上海。”^⑫由此可确知，季理斐的“报社转载赠刊”策略亦扩大了广学会报刊发行范围。与此同时，季理斐本人的文章也以报刊为载体传阅于中国各地。据李路德回忆：“大概中国有一千五百多县，每县有多人读过季理斐所译的书报。”^⑬不过，季理斐字里行间常将上帝视为社会改良的“灵丹妙药”，存在过度美化基督教的弊端，也脱离了中国的社会现实。

(三) 首创传教士报刊“制度化阅读”的风尚

以季理斐、李提摩太、高葆真为代表的广学会编

表1

年份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1909年	1911年
发行册数	56234册	78000册	153800册	195000册	180000册	119630册
发行页码	224936页	986000页	5804800页	7800000页	7200000页	4785200页

辑群体,实行官员代销报刊的发行策略,在地方官员体制内呈规模化的订购场景,首创近代中国传教士报刊“制度化阅读”的风尚。当时,《大同报》一度在中国精英阶层盛行:“满洲总督每周订购200份,广东布政使订购300份;福建布政使订购400份;山西巡抚订购500份;山东巡抚订购900份。但最令人惊讶的是西部新疆巡抚订购了900份。”^⑤中国社会精英群体订阅广学会发行报刊,与其西学传播紧密相关,“知夷情”方能“制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便是从中接触西学,从而踏上维新之途。

广学会发行的系列报刊,某种程度上为近代中国报业提供了素材。晚清时期,饶有名气的《四川官话》《秦中官报》《四川教育官报》《预备立宪公会报》时常从《大同报》转载最新教育、农学、理财的文章。《女铎》被公认为中国第一份由书局出版的中文妇女刊物。^⑥在季理斐担任总干事期间,《福幼报》发展成为民国运营最为成功的儿童报刊之一,日本儿童月报《光明之子》便是照此仿办。某种程度上,这些报刊在传递“新知”层面对于近代中国报刊的开蒙具有一定启迪。

(四)建构了季理斐在华交游网络

季理斐参与广学会发行报刊的编排、推广工作,以此为契机,结识中国的政要、文人与教徒,建构了在华交游网络。他将主编《中西教会报》当作很好的锻炼机会:“我感激涕零地接任主编一职,并以此为开路,接触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传教士和助手。”^⑦季理斐在推行官员代销《大同报》之际,与中国权贵有广泛接触。这在黎元洪答复季理斐信函中有所体现:“凡我士大夫,皆知感激。”^⑧不过,这也与季理斐常撰文恭维袁世凯、黎元洪有关,发表社论称“中国由专制而共和,论首功当推袁黎正副二总统”^⑨。广学会编辑杭海对此不齿,批判道:“可为广学会出报之惟奇耻大辱焉。”^⑩

季理斐在广学会经营的报刊上刊文不胜枚举,伴随报刊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其亦名声大噪,并在

其他机构兼职。1910年,季理斐担任华洋义赈会的中西书记员。任职期间,与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沈敦和、朱佩珍等上海绅商社会的头面人物建立友谊;1916年,季理斐在潘慎文的引介下继任格致书院藏书楼馆长;1919年,季理斐担任广学会总干事,进一步扩大其在华交游网。此时,张伯苓担任广学会名誉会长,郭秉文、卜舫济、刘廷芳、余日章、吴镇守任名誉副会长,董事会成员有罗连炎、胡其炳、诚静怡、江长川、胡貽穀等人。由此,季理斐以广学会为依托与中西教会领袖形成密切的互动往来。

1923年,季理斐以李提摩太藏书楼建成为契机,在社会上广泛联系政要庆祝广学会成立36周年。据《广学会36周年纪念册》记载,中华民国内阁总理唐绍仪、福建省长萨镇冰、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山西省长阎锡山、北京步军统领聂衷藩、陕西省长刘镇华、内阁总长张远伯、上海县知事沈宝昌等人均向季理斐致函祝贺李提摩太藏书楼的落成。当时,孙中山向季理斐亲笔致函,肯定他为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阁下立志宏远,造福人群,远离贵国,惠来东土,本基督博爱平等主义,冶东西文化于一炉。萃欧美之精华,补东方之残缺,撮吾华之美德,正欧俗之偏倚,融洽中外,迪政堦民,良法美意,莫逾于此。”^⑪

不过,当时非基督教运动已经开始蔓延,即便政府官员给予广学会一定的支持,也无法抵挡中国民族意识觉醒之际民众对于基督教的抵制,民众游行示威的反教活动此起彼伏。季理斐感言:“罢工、抵制和暴乱,我们早已司空见惯。基督教似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结盟,因此必须被驱逐。”^⑫中国民族主义、排外思潮、反基运动接踵而来,广学会在华报刊发行事业举步维艰,最终季理斐带领广学会彻底走向本色化转型的道路。

结语

集而观之,季理斐参与并推动了广学会报刊发行事业,对近代中国报业繁荣乃至社会变革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他既是《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

《大同报》的主编,也是重要撰稿人,发表诸多传播西学的文章,其主观目的在于辅助传教,但布道效果一般,反倒促进了西学知识进入阅报者的视野。季理斐深知阅读世界存在不同群体的利益牵连,试图将报刊发行嵌入地方官员交游网,以此拓宽广学会报刊发行范围。民国时期,季理斐主持的新闻局以“转载赠刊”的方式向社会抛出橄榄枝,在广学会与各地报社之间形成互动往来。多番转载的文章,广泛传阅于阅报者之间,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化市场中的共享知识文本。季理斐本人亦藉此接触中国社会精英群体,构建了其在华交游网。然而,“知识权力关系的形塑过程,绝对不是殖民者单向的施为”^⑤,晚清民初的中国士人虽急于引介西学知识来增广见闻,以实现救亡图存的愿景,但绝未屈从于西方的文化霸权。他们熟稔书本,往往博览群书来扩展西学阅读空间,不会只将目光集中于某一出版机构发行的出版物,对于知识有所鉴别地汲取。且中国本土出版机构兴盛,构建中国“知识仓库”的重任更多由国人担当,这为政府官员、文人提供了更多的讯息发布平台,亦分散了广学会的书报订阅群体。因此,季理斐难以实现向“百万人传教”的目标。

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强调出版在创造“想象的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的效力。^⑥季理斐在华从事出版活动的意图旨在在中国民众的头脑中建构上帝至上的宗教意念。为服务于这一目的,季理斐在报刊撰文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通过控制文本来干预读者的阅读体验。一方面,他的作品将中国塑造为落后、封建的形象,站在“基督救赎世人”的福音立场,劝导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来改良社会,另一方面,他批判中国祖先崇拜、儒学及佛教思想,以凸显基督教的至高无上。学者冯承钧坦言其意图无非是“扬本教而抑异教”,“所持以攻儒家之说,多支离荒诞之言,不足辨也”。^⑦季理斐虽一直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力主和平,但从文化视角来看,却始终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至上

的姿态来审视中国,这无疑是西方文明自我优越心理的映像。这对中国对待外来文化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既要保持不同文化互动交流时的平等地位,求同存异,同时也要对西方中心主义予以批判。

注释:

①《广学会对于文献上之贡献》,《申报》1937年7月7日,第23048号,第16页。

②季理斐文学研究成果可参见杨晓春:《〈回教考略〉与清末民初的回耶对话》,《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3期;余恒:《辞书中的二十四节气英译源流考》,《中国科技术语》2014年第4期;刘瑛:《西北边荒布道记及其史料价值》,《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宋艳华:《季理斐〈华英成语合璧字集〉与中西文化交流》,《辞书研究》2020年第4期。季理斐主持广学会活动研究成果参见李巍:《季理斐在广学会活动述评》,《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陈喆:《20世纪初广学会文字出版事业方针的转变》,《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2期;邵金远著:《近代豫北医学传教史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季理斐豫北置产活动研究成果参见宋艳华:《加拿大长老会早期豫北置产活动之考察》,《宗教学研究》2020年第4期。

③④The 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for the year Ending October 31st, 1888, Shanghai: Society's Office, pp.3, 4, Box 79. 190C, 3 of 3,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⑤[英]李提摩太:《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转引自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页。

⑥具体内容详见[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3页。

⑦⑧⑨Memoirs, letters, articles, written or edited by, or of interest to Rev. Donald MacGillivray, M. A., D. D. [1888-1931], pp.58, 293, 296, Uncertain editing time, Box BV3427. M3 Large,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⑧1868年,林乐知在上海创刊时,取名《中国教会新报》,

译名为“The News of Churches”;1872年8月31日,该报从第201卷起更名为《教会新报》,译名为“The Chinese Globe Magazine”;1874年9月5日,该报自第301卷起改名为《万国公报》,译名为“The Chinese Magazine”。

⑨《广学会六十周年定明日举行庆祝》,《申报》1947年12月3日,第25073号,第4版。

⑩具体可参见周伟驰:《康有为创办的北京〈万国公报〉各期内容及其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1期。

⑪1906年3月,《万国公报》第206册起,至第215册,季理斐担任代理主编;216册至220册,林乐知重新担任主编;1907年,从221册起,到227册止,季理斐担任《万国公报》正式主编。

⑫The 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for the year ending October 31st, 1890-1891, Shanghai: the Shanghai Mercury Office, 1891, p.9, Box 79. 190C, 3 of 3,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⑬The Letter from MacGillivray to Dear Friends, January, 1909, Box1Files 1-20 FA 45,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 Western Section,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Correspondence, 1900-1913,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⑭《教会公报布告书》,《中西教会报》,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号:U131-0-114-552。

⑮中华续行委员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6期,上海:中华续行委员会,1921年,第129页。

⑯莫安仁、徐惟岱:《大同报改良发刊词》,《大同报(上海)》1907年第7卷第1期,第7页。

⑰《山西巡抚恩艺棠中丞照片:附恩艺帅来书》,《大同报(上海)》1907年第7卷第8期,第1页。

⑱季理斐:《医学之新方针》,《大同报(上海)》1914年第20卷第16期,第36页。

⑲薄玉珍、何慈洪:《从广学会看杂志文学的价值》,《希望月刊》1948年第2期,第5页。

⑳㉑The Letter from Donald MacGillivray to Ta Tung Pao Dear Friend, June 8th, 1913, Box1, file9,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Shanghai Mission, January-June, 1913,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㉒The Letter from Donald MacGillivray to Dr. MacKay, June

23th, 1915, Box1, file13,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Shanghai Mission, January-June, 1915,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㉓林辅华、叶柏华:《广学会近年工作概况》,《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短讯》1937年第6期,第4页。

㉔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Quarterly Link With Our Friends, Fifth Term of Service_Letter No.1, December 4th, 1919, p.3, Box 2008. 040C 1-10,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Quarterly Link With Our Friends,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㉕㉖㉗㉘Margaret H. Brown, MacGillivray of Shanghai: the Life of Donald MacGillivray, Toronto: The Ryerson Press, 1968, pp.142, 96, 132, 132.

㉙季理斐:《中华教会自立自养之善喻》,《中西教会报》1910年第18卷第5期,上海档案馆馆藏,馆藏号:U131-0-113-300。

㉚《民政部尚书肃亲王殿下:附肃王爷来书》,《大同报(上海)》1907年第8卷第1期,第1页。

㉛“Good News From Japan,”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XXXVII, December, 1906, p.708.

㉜The Thirty-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1917-1918,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8, p.10, Box 79. 190C, 3 of 3,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㉝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第1110页。

㉞《山东藩台吴赞臣方伯:附吴方伯来书》,《大同报(上海)》1907年第7卷第7期,第2页。

㉟《山东抚台杨莲府中丞肖像:附杨中丞来书》,《大同报(上海)》1907年第7卷第9期,第1页。

㊱《两广总督周玉山制军:附周玉山制军来书》,《大同报(上海)》1907年第7卷第10期,第1页。

㊲《山西巡抚恩艺棠中丞:附恩艺帅来书》,《大同报(上海)》1907年第7卷第8期,第1页。

㊳《陕西抚台曹仲铭中丞:附曹中丞来书》,《大同报(上海)》1907年第8卷第3期,第1页。

㊴《山东藩台吴赞臣方伯照片:附吴方伯来书》,《大同报(上海)》1907年第7卷第7期,第2页。

③⑨ The Letter from Donald MacGillivray to Dr. MacKay, November 6th, 1914, Box1, file12,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Shanghai Mission, July–December, 1914,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④⑩ The Letter from Donald MacGillivray to Dr. MacKay, November 10th, 1913, Box1, file10,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Shanghai Mission, July–December, 1913,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④⑪ The Letter from Donald MacGillivray to Dr. MacKay, June 9th, 1914, p. 2, Box1, file10,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Shanghai Mission, January–June, 1914,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④⑫ 同注④⑩,同一封信函,无页码标注。

④⑬ 《本报十周年纪念祝词之袁大总统祝词》,《大同报(上海)》1914年第20卷第9期,第1页。

④⑭⑯ 《本报十周年纪念祝词之黎副总统颂词》,《大同报(上海)》1914年第20卷第9期,第2、2页。

④⑮ 《本报十周年纪念祝词之陆军段总长颂词》,《大同报(上海)》1914年第20卷第9期,第3页。

④⑰ [美]詹姆斯·W·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④⑱ 贾立言、陈德明:《广学会早期出版物》,《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短讯》1937年第3期,第10页。

④⑲ Box 79. 190C, 3 of 3,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④⑳ 季理斐:《基督教文字事业的乐观》,《中华基督教文社月刊》1925年第1卷第2期,第22页。

⑤⑰ Women's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The Planting of The Faith: A Further Story of Our Missions, Toronto: Women's Missionary Society,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1921, p.112.

⑤⑱ The Eigh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1904–1905,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05, p.17, Box 79. 190C, 3 of 3,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⑤⑲ 《贵州抚台庞渠庵中丞:附庞劬庵中丞来书》,《大同报(上海)》1908年第9卷第7期,第1页。

⑤⑳ The Twentie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1906–1907,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07, p.9, Box 79. 190C, 3 of 3,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⑤㉑ F. Rawlinson, D. D., Chairman, Miss Helen Thoburn, Rev. D. MacGillivray, The Chinese Church As Revealed in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Held in Shanghai, Tuesday, May 2, to Thursday, May 11, 1922, Shanghai: Oriental Press, p.319.

⑤㉒ 李路德:《季理斐博士与中国教会(续)》,《兴华》1931年第28卷第24期,第26页。

⑤㉓ [关]何凯立著,陈建明、王再兴译:《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7页。

⑤㉔ 季理斐:《论袁黎正副二总统之新喻言》,《大同报(上海)》1914年第20卷第30期,第1页。

⑤㉕ 党德信总主编,李树人、方兆麟主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3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72页。

⑤㉖ 《复季理斐博士函》刊载于1923年10月发行的《广学会三十六周年纪念册》,转引自舒波:《孙中山佚文两篇》,《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第7页。

⑤㉗ The Thirty-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1921–1922, 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22, p.4, Box 79. 190C, 3 of 3,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⑤㉘ 潘光哲著:《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3页。

⑤㉙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6页。

⑤㉚ 冯承钧著,邬国义校:《冯承钧学术著作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39页。